

延安时期参议会的生动实践

□ 薛永毅

延安时期的参议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苦的局部执政条件下实施民主政治、开创民主新风的重要组织形式。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实行，不仅使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学会了民主权利的行使，也使党员干部受到了民主运动的锻炼和考验，还为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打下了基础。1941年延安召开的第一届参议会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发动群众认真而严肃地检查政府工作

1941年至1946年间，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市先后共召开了二届三次参议会。其中，第一届参议会于1941年10月10日至18日在延安市商人俱乐部召开，历时9天，参加的参议员、候补参议员有67人。此次会议的议程之一，就是听取、讨论延安市政府3年来的工作报告，这是整个会议的关键环节。

延安市第一届参议会期间，参议员们均能以认真、严肃和负责任的态度，全面履行作为“群众代言人”的职责。他们对延安市政府工作报告和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认真审议，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好的加以表扬，坏的毫不留情地加以批评。在讨论延安市政府工作报告时，先分小组进行讨论。小组讨论结束后，由大会批评政府工作。大会批评中，参议员人人踊跃发言，52人中仅有3人未发言，甚至有一人先后4次发言，对于行政机构、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军民关系、抗战动员、卫生保健、市政建设等方面，均提出深刻的批评。大会会员质问者40余起，批评政府工作者200余起，建议50余起，全面检视了3年多来的政府工作。

在检查、批评政府工作中，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讲实话、讲真

话；另一方面，对于群众激烈而又富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则认真听取，虚心接受，立行立改。如在分组讨论延安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参议员首先批评政府筹备工作做得不好，报告未印出，报告时又很零乱，不具体，有些数字不确实等。按照原定的大会会议程序，大会第4日的议程为分组检讨政府工作报告，但因会议前期准备不足，拖延了会期，故第4天小组讨论才半天，便企图紧缩讨论时间，以确保大会如期结束。但是，全体议员以检讨是大会的中心工作之一，不应马虎草率，予以坚决反对。最后，决定将大会予以整顿，并延期两天。被大会批评的市长、地方法庭庭长、公安局局长等，均忙做笔记，以备明晨之答复。且在各议员的批评之下，态度甚为虚心和蔼。

让提案协商真正互动起来

参议员的政治参与和参政议政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具体实践中提出的一些重要且具有推广价值的提案。纵观延安市第一届参议会的提案工作，从数量上看就达200件之多。提案的内容更是涉及政治、军事、市政建设、文化教育、财政经济等。通过提案这种形式，鼓励人民广泛参与政权建设，也极大地提升、锻炼了参议员运用民主和行使权力的能力。

议案能否通过需要票决，但议案的质量却无法通过票决来保障，而是以协商民主的方法，通过对话、沟通、讨论，广泛听取和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达成共识，才能有效保障。延安市第一届参议会的基本做法是：提案在选择和确立过程中多方调查和沟通交流，重视参议会表决前的充分审

议和热烈讨论，从而既有效提高提案的质量，同时也较好地实现了各方对提案的共识，有利于提案的通过及通过后的实施和执行。第一届参议会召开前，各参议员先集中到市政府会议室，相互交换提案，并征求附议人。参议员新文字工作者马小云拿出了她的三个提案，四面八方地征求附议人，对于“规划延安市为新文字试验区”一案，她解释道：“我们万不敢小看这事，这是中国文字上的大革命，这个实验如得成绩，对于国民教育，将指出一个新的方向。”会议期间，充实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分设政治、经济、财政、教育、军事五组，分组整理提案。会期共9天，分组审查和大会讨论提案工作共用时一天半，比较充足的时间安排，确保了参议员充分、民主地审议和讨论各项提案。最终在充分的讨论和协商中，经延安市第一届参议会审议并获得通过。

延安市第一届参议会提案工作的另一个显著特点，还在于提案的实践性和执行性。也就是说，提案一旦经参议会审查通过，就变成了参议会对延安市政府的指令，成为政府工作的根本准绳。例如，在延安市第一届参议会闭幕后不到一周，新选的延安市政府委员会即召开第一次会议，决议本周内印出市参议会全部提案，以便制定明年度工作计划。

注重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交融互动

边区参议会制度的选举，不仅是普遍、直接、平等的民主选举，还体现为协商民主和票决民主的交融互动，即在选举过程中的提出候选人、确定候选人等环节中反复酝

酿、充分讨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确定最终候选人。这些做法，在延安市第一届参议会也得到充分的体现。

协商民主在前、票决民主跟进。民主选举产生的参议会是边区权力机关和民意机构，它又代表民意产生各级政府。为此，参议员如何行使好职权，选出人民信服的公职人员，则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由于票决民主遵循的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导致其形式合理性有余而实质合理性不足。为此，注重在票决表决前，通过充分的沟通、对话、争论和协商，达成妥协和共识，这是延安市第一届参议会民主选举工作的基本经验。如在参议会召开前，就候选名单进行充分的协商、讨论。讨论不以选民大会方式进行，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深入的各群众团体、各机关系统讨论。与此同时，要求各党派各团体普遍介绍候选人，掀起竞选热潮。为了使参议员充分了解政府工作开展情况及候选人情况，一般在选举前要彻底检查政府工作，而且必须认真进行，并必须在检查工作完毕之时方可开始进行选举。例如，第一届参议会首日的大会预定下午四时结束，但在选举大会秘书长与各委员会后，即已五时了，有一个参议员主张省事地用举手表决选出正副议长，然而大会却认为选举正副议长更要特别慎重，所以留待明天详细介绍后，再用票选出。最后进行的选举，也是慎重的，先自由提出市长、政府委员、常驻议员等候选人，一一介绍，大家讨论，然后投票表决正式候选人，以后再进行正式选举。



人的三大法宝之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后，中国共产党继续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道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的组织形式。虽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我国统一战线的内容、性质和任务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统一战线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大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它为调动社会各阶层的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正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标志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爱国统一战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统一战线重新得到落实，明确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任务。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提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这就更加密切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进入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其范围扩大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对于把中华儿女广泛团结起来，投身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伟大实践，聚合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1957年起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作为医生的吴阶平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近20年。吴阶平生前曾说，他一生最大的幸事是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周总理那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先人后己的高尚品德、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无声地激励着他，使他立志要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

“要把辩证法运用到临床思维上”

吴阶平1917年1月22日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1937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同年考取北平协和医学院，1942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1947年经著名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教授推荐，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师从现代肿瘤内分泌奠基人哈金斯教授，1948年12月吴阶平谢绝了导师挽留他在美国工作的一番好意，毅然回国。

回国后，吴阶平来到北京医学院工作。由于他精湛的专业技能和可靠的政治素质，赢得了周恩来的高度认可，多次交给吴阶平医疗卫生任务，双方有较多的接触机会。1960年9月的一天，周恩来开完会已是凌晨时分。吴阶平为了让周总理把工作暂时放下，分散一下注意力，提议陪同周总理一起散散步。

散步之际，吴阶平陡然想到周总理1956年1月1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时说，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二是经过自己的业务实践；三是经过一般的理论学习。社会实践和理论学习对自己思想的影响，吴阶平体会较深，但却体会不到业务实践的影响。吴阶平就此向周总理请教。

听了吴阶平的想法，周总理沉默了一下，说：“你先谈谈你的业务工作吧！”吴阶平于是简要地把自己的医疗和科研工作说了一下。

周总理问道：“你为什么要研究肾结核呢？”吴阶平回答说：“这种病很常见，许多人死于这种病。”

周总理又问：“你为什么能发现所谓不治之症的双侧肾结核患者，有的并不是双侧肾结核呢？”吴阶平说：“诊断为双侧肾结核的病人中大部分确有足够证据说明两侧都有结核病，但是其中一小部分只是证明了一侧是肾结核病，另一侧肾也有病，但并无足够证据说明是结核病，一般诊断证据中有漏洞。所以我设计了不同于常规的诊断方法，查明了这种情况，这部分病人是可以挽救的。”

“要把辩证法运用到临床思维上。我听你所讲的，其实已经在不自觉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自己的工作，而且能从病人实际需要出发，系统地发现前人认识中的不足之处，因而有所创造。这就很好，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威力。”周总理高兴地说。

后来吴阶平经常讲，周总理分析问题，从全面到局部，从理论到实践，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地把辩证法运用到临床思维上去，使他深受教育，茅塞顿开。

“要做好‘医疗外交’中特殊的‘大使’”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吴阶平就代表中国参加各种国际会议，他出访各国，成为中国“医疗外交”中特殊的“大使”。如1954年到朝鲜参加金日成主席疾病的会诊，1962年为印尼总统苏加诺治病，等等。为苏加诺治病是情况最复杂的一次。就是这次治疗活动，显示了吴阶平高超的医学技术和出色的政治智慧。

1961年底，印度尼西亚方面希望请中医专家去给苏加诺总统治病。从团结第三世界打破西方封锁的目的出发，周恩来亲自过问，点了吴阶平的将。

周恩来还专门跟医疗组谈话，要求“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尽一切可能为总统治疗，也要多为群众服务。要做好‘医疗外交’中特殊的‘大使’”，并任命吴阶平担任医疗组组长。

1962年初，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吴阶平率领中国医疗组，由北京飞往印尼。此时的印尼政局不稳，为了应付复杂局面，医疗组在专机上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作为一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很清楚去为苏加诺治疗由于肾结石而使机能遭到阻碍的左肾，这意味着什么。他铭记着出发前周总理的教诲，心里明白，“这首先是是个政治任务，必须全力以赴”。

中国医疗组利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经过4个月的大胆探索和艰苦努力，取得了十分完满的结果。苏加诺的私人医生、商业部长苏哈托专门把各国记者请到总统别墅，发表声明表示感谢，并介绍以吴阶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医学专家们同志们见面。声明说，为总统进行治疗的西方医疗组曾经认为，总统的肾脏如果在3个月内或者最迟6个月内不能恢复机能，那么就必须动手术。由于中国医疗组的治疗，苏加诺总统的健康情况极为良好，特别是他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吴阶平

□ 罗元生

的左肾已恢复功能，可以避免动手术了。苏加诺和夫人设宴欢送中国专家。吴阶平为此被授予印尼国家二级勋章。

后来，受周总理的委托，吴阶平又先后11次为5个国家元首进行治疗，每一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要严谨认真地对待保健工作”

吴阶平最被外界所知的，是他作为周总理医疗组组长。周总理多次对吴阶平指出，保健工作不能出现丝毫差错，要精益求精，要严谨认真地对待保健工作。吴阶平不负周总理的重托，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了各项复杂而敏感的保健任务。周总理曾对别人说：“交给吴阶平的任务都能完成得很好。”

而对周总理的晚年医疗保健中，吴阶平无不为周总理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1972年5月19日，周恩来在一次尿常规化验中，发现红细胞超出正常值，吴阶平从上海、天津请来老专家一同会诊，确诊为膀胱癌。吴阶平等4人共同向中央写书面紧急报告，请求为周总理做膀胱镜检查。

对周恩来的病情，医疗组专家的意见高度一致：一定要及早检查、治疗，必要时动手术。而此时的周恩来还是一味地拼命工作。

1973年1月，吴阶平得知周总理已经开始尿血的消息，心急如焚，便拿着血尿的试管、化验单，找到住在西山的叶剑英。几天后，叶剑英拿着装有周总理血尿的试管，到南海报告毛泽东。第二天，中央批准了医疗组的报告。两个月后，周恩来终于住进了玉泉山的临时治疗室，接受膀胱镜检查。

1973年10月底，周恩来又出现血尿，癌细胞再度抬头。吴阶平和几十位专家讨论了多次，大家的结论是一致的：必须尽快进行手术治疗。

1976年1月7日深夜，昏迷已久的周总理微微睁开眼，看见守候在床边的吴阶平说：“吴大夫，我这儿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的一句话。在此后的20多年里，吴阶平每提及此事都感伤不已：“总理一生关心别人，就在大脑已经很少有活动能力的时候，关心的还是他人。”

“总理对我的教诲，使我终生受益。”吴阶平生前多次这样说。在他家里一直挂着一张12寸的周总理的黑白照片，书橱里摆放着周总理送他的一座石英钟。多年来，吴阶平一直用这种方式来默默纪念着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2011年3月2日晚，吴阶平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我党历史上的五次统一战线

□ 韩长代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今，共经历了五次统一战线。在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统一战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任务、内容以及特点。

国民革命联合战线

1922年7月，党的二大作出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初步提出统一战线的方针。1923年6月召开了党的三大，决定在保持中国共产党独立性的条件下，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合作。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同志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毛泽东还代理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有共产党员出席并参与领导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告接受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这也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国民党一大还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的原则，并选举产生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党中央领导机构。从而使国民党大体上是由代表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改组成为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联盟。改组以后的国民党本身就成了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革命联

合统一战线的形成，大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从而使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得以顺利进行。

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1927年，由于国民党右派集团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群众，使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暂时附和了反革命分子，因而使得革命统一战线的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以反对封建压迫和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为目标，建立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中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政权组织。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将关于农民问题的一系列正确观点，运用于土地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使中国革命统一战线从此开始建立在牢固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随之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和毛泽东在会后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同时，中共中央也将抗日反蒋的方针转变

为“逼蒋抗日”的方针。

1936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国民党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础上率先形成了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并最终导致了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从而实现了由内战到和平、由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

1937年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22日，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发表的关于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为标志，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了。随着抗日战争的进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热切希望能以和平、民主和团结的方式建设国家，继续坚持两党合作，团结其他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力量，为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奋斗。但是事与愿违，历史的发展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坚持独裁的反动立场，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发动了反革命内战。

为了推翻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了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推翻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成为我党战胜敌